

Avskrift.

Dr. J.G. ANDERSSON

Ta Tsao Chang,

Peking.

中國近代科學史上的重要文獻

Peking den 4. sept. 19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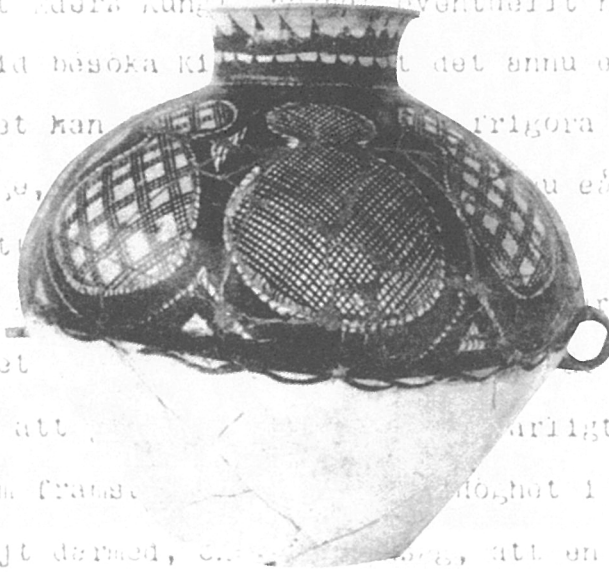
安特生致瑞典皇太子的信及其釋讀

Till Hans Kunglig Höghet kronprinsen,

Stockholm.

Eders Kungl. Höghet,

Under konfidentiell form har överintendenten Lagerlius meddelat mig, att Eders Kungl. Höghet eventuellt har för avsikt att i en nära framtid besöka Kina. Det ännu ej är klart, hurvida Era Höghet kan tillbringa några dagar i Kina, eller om du frigora sig från sina plikter i Sverige, och om du då länge föreligger endast på ett kort besök i Kina.



Tanken på att Eders Kungl. Höghet skall besöka ett så stort och viktigt land, åt vilket Era Höghet äro så nära förbundna, och som ju så nära till hands liggande, att det är naturligt för mig att naturligt funderat på att rikta en vordsam framsägelse till Eders Höghet i denna riktning. Men jag har drojt därmed, och jag har varit öfverförsäkrad, att en sådan framställning skulle kunna anses tactlös. Nu då jag erfar att saken är på tal, kanske jag vågar rikta en sådan framsägelse till Eders Höghet som ett ringa bevis på den livliga glädje varmed jag naturligtvis genast har uttryckt till denna framsägelse.

1935年6月，安特生在甘肅和政縣邊家溝發掘到的彩陶，這時他以為甘肅的彩陶遺址年代比河南早，後來他才覺悟，事實正相反。

馬思中 (Magnus Fiskesj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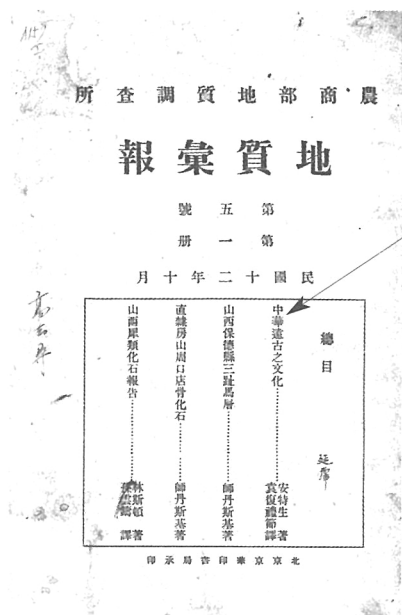
瑞典東方博物館

陳星燦

北京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Höghet själv, utom drister jag ej yttra någon mening, dess mindre som jag ju just ingenting vet om besöket närmare planläggning och omfattning. Däremot har jag att få uttala min mening om besöket betydelse för Sverige och Kina.

安特生 (J.G Andersson, 1874-1960) 是中國近代考古學的重要開拓者。作為仰韶文化的發現人，他在瑞典以Kina Gunnar的名字被人熟知^①。仰韶文化的發現，也被視為「劃時代的發現」，而加載史冊^②。實際上，關於安特生在中國從事地質、考古活動和對中國地質、古生物學及考古學的貢獻，一直都是中外學術界關心的話題^③。2001年9月下旬，我們在瑞典東方博物館發現了一封1921年9月4日安特生從北京寄給瑞典國皇太子(H.R.H. Crown Prince Gustaf Adolf)的一封長信，對於理解安特生豐富的內心世界，卓有幫助；對於近代中國科學史的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因翻譯如下，併略做考釋^④。



編者按，安特生寄出本文披露的信後，於10月赴河南省滎池縣仰韶村發掘。仰韶遺址是中國境內發現的第一個史前村落遺址。安特生於1923年以英文發表〈中華遠古文化〉，正式將「仰韶文化」介紹給世人。

此篇以上為民國十一年一月在文友會講演之稿。彼時予以為石銅時代東西有交通之証。可供參考者，惟賴施密特及本拍利二氏之作。嗣余欲與諸考古學家解決此重要問題，乃將第十三版圖及陶器數片送瑞典國皇太子殿下鑒定。殿下固精於考古學者，五月間復往遊倫敦，更與英國博物院諸專

編者按，關於仰韶文化之來歷，安特生最初認為：仰韶彩陶與歐洲、中東的某些彩陶，「器工花紋皆有極似之點……實令吾人不能不起同出一源之感想。」但是他在篇末注明，這個問題尚待進一步求證，瑞典皇太子是他求助的專家之一。

- ① Niall J. Mateer and Spencer G. Lucas, Swedish Vertebrate Palaeontology in China: a history of the Laterlius Collection,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Institutions of the University of Uppsala, New Series, Vol. 11, pp. 1-29, 1985. 所謂Kina Gunnar就是「中國的古納」的意思，Gunnar是安特生的中間名字，他的全名是Johan Gunnar Andersson.
- ② Bernhard Karlgren, Johan Gunnar Andersson in Memoriam, 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33, p.V, 1961. 高本漢在此文中稱仰韶文化的發現為「an epoch-marking find」，即「開紀元」或「劃時代」的發現。
- ③ 參見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史研究（1895-1949）》，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北京，1997；Mateer and Lucas, 1985.
- ④ 此信原藏東方博物館，注明是抄件，但有安特生的親筆簽名。安氏給別人的信件，大都有抄件，而且基本都是打印而成，即使在甘肅考古期間也不例外。原件系瑞典文，由馬思中譯成英文，陳星燦將之轉譯為中文。在此需要說明的是，東方博物館是該館正式的中文名字，它的瑞典名字是「Ostasiatiska Musset」，即「東亞博物館」，英文名字是「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即我們熟知的「遠東古物博物館」，在此我們使用該館的中文名字。該館的中文館名見於中英文對照的「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即《東方博物館介紹》一書的封後（斯德哥爾摩，1971）。

J.G安特生博士

大草廠

北京

北京，1921年9月4日

皇太子殿下

斯德哥爾摩

尊敬的殿下：

拉格里奧斯會長很有信心地告訴我殿下可能有意在不久的將來訪問中國。但是殿下能否離開瑞典這麼長的日子還說不定，這個計劃因此遂在初擬之中。

我認爲殿下應該到這個您付諸精力研究的國家看看，這個念頭揮之不去，有好幾次我都很嚴肅地考慮過向您直接稟報我的建議。但是我沒有這樣做，因爲我認識到這樣的做法也許有失尊敬。現在，當我知道這個事情已經提上日程，使我難奈心中的喜悅。

我不敢冒昧猜度殿下訪問中國對殿下本人的可能意義，因爲我對殿下的訪問計劃和日程幾乎一無所知。但是另一方面，請允許我談一點這樣一次訪問對瑞典和中國的意義。

對於我們瑞典的聲譽來說，毫無疑問，殿下的訪問必是非常愉快而又富有成果的保證。據我看來，相信這也是事實，我們的對華貿易很少，與這個巨大的潛在市場事實上所應該得到的很難相稱。瑞典對日本和中國感覺興趣的程度，很難通過我國在這裏的投入得以體現。瑞典是斯堪地納維亞最大的國家，卻是在北京唯一沒有長設領事的國家，而同時瑞典都又是三個斯堪地納維亞國家唯一在首都駐有中國領事的國家。和中國人談論這個事情很讓人不自在，因爲他們可能不全理解，他們甚至會認爲這是對中國的藐視，因此這對我國的利益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殿下的來訪必將增進中國人對在華瑞典人的友誼，瑞典對中國感覺興趣這一事實也必將因此得到更深入的理解。無論訪問採取什麼形式，必將引起萬眾矚目。因爲中國政治上的積弱，中國人對於任何被放在第二等位置的做法都非常敏感，因此這樣一次高規格的訪問，必將引起對中國的深切關注，而不會以任何方式冷落了任何其它國家。

這是從瑞典方面獲得利益的角度來考慮的。說到中國，我認爲它應該得到更多，在這個方面我願意略陳私見。

我想殿下在華訪問期間，可能不願被人當成旅行的顯貴或者觀光的遊客，可能更願意被視爲英國人所尊稱的學者(Scholar)，更願意是一個帶著同情心和興趣來探索這個綿延數千年之久的奇妙的中國文化的發展軌跡的學問家。因此，我相信殿下來訪肩負著一次偉大的和倍受歡迎的文化使命。

我這樣說，是因為我相信殿下也會像在國內一樣準備親自動手參加這裏的田野工作。事實是，中國腐朽的官僚制度鄙視上層階級的成員參加任何體力勞動。我們遇到了這樣的困難，但是我們已經為中國政府培養出一群年輕的地質學者，他們把親自動手參加野外作業視為平常。

現在，如果像殿下這樣無尚尊寵的人，來到這裏謙虛地蹲在考古遺址，手執小鏟，那對展示科學的神聖性將發揮巨大的道德作用，即便採取了這樣一種屈尊的形式。

在這個不幸的、被貪婪愚蠢的軍閥的無意義的爭鬥弄得四分五裂貧困潦倒的國家，對科學研究的一點點興趣，儘管可以按照西方更有效的工作方法加以引導和組織，但還在起步階段。

毫無疑問，不同類型的中國學者都會高興和您見面並與您交換意見和經驗。我堅信，也向您保證，這樣的交流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如果就鼓勵中國人開展科學研究而言。無疑還會有很重要的影響。

還有，所有熱愛古代中國文化的人，都對目前這個國家無與倫比的文化遺產幾乎沒有得到任何保護的狀態感到痛心疾首。從這個方面說，呼籲保護是必要的，已有一些外國人試圖在這個方面對中國人施加影響。

但是恐怕這些努力常常是不適當的或者對中國人竟是侮辱，因此我相信殿下的來訪，無論從哪個方面考慮，都對推動中國文物的保護有極重要的價值。

我請求您寬恕我在此提出上述建議。如果殿下認為這些建議還有任何可取的地方，懇請您允許我與您再次聯繫，當然，即便在殿下離開瑞典之前，如果需要為我斗膽在這裏提出的文化使命作準備的某些資料，我將會非常榮幸。

至於訪問的時間，據拉格里奧斯說，我理解也許在中國會停留幾個月。從這個方面考慮，有必要向您說明這裏最好的工作季節是秋天，因此八月到來也許最為適宜。

作為一個微不足道的角色，我將非常高興追隨左右以便提供我力所能及的、無足輕重的服務。因為我的聽力受損，我不能夠說中文，通常與人交流也有一定困難，所以我也許不能有很多幫助。但是，我將高興調整我自己的旅行計劃，以便能夠追隨左右。我也許可以把科學上卓有造詣的年輕的中國知識精英引見給殿下。

當然，在殿下來訪期間，卡爾貝克工程師如果能在中國最為相宜，因為就殿下的興趣而言，沒有人比他知道的更多。

敬禮

安特生

古今

論衡

安特生在這封信中，說得很清楚，關於皇太子訪問中國的消息，是從拉格里奧斯（A. Lagrelius）^⑤那裏得到的。但是，爲什麼這個擬議中的訪問，一直到1926年方才實現，我們沒有發現更多的檔案資料。不過從安氏後來的文章可知，倒不是瑞典方面的因素，中國一二十年代的軍閥割據和戰亂頻仍，恐怕是訪問遲遲不能實現的主要原因^⑥。

瑞典皇太子的訪問，在中國曾有廣泛的報道。他訪問中國的日子，也確是按照安特生的建議，即秋天——北京最好的季節——到達的。先在北京待了十多天，即從1926年10月17日到31日，除了參加北京學術界的歡迎會之類，就是參觀故宮和十三陵等名勝古蹟，觀察公私收藏的文物，得到中國官方和學術界的盛大歡迎。他來華的目的之一，是考察中國的史前文化遺址，這也是安特生建議的，但是由於道路不靖，不克到著名的仰韶遺址，而當時山西是北方比較安定的地區之一，又有瑞典人奈斯特羅姆

(Nystrom)及其在太原建立的科學研究所的協助^⑦，所以最終決定把考察安排在山西。在山西地方當局的安排下，皇太子由安特生和拉格里奧斯等陪同，在太原附近的兩個石器時代遺址作了考察。從後來發表的照片看，皇太子手持手鏟，和拉格里奧斯及奈斯特羅姆一道，在遺址中發掘。皇太子所挖灰坑眼前的土台上，雖有穿制服的警察，但更多的是穿著黑棉褲、頭戴白毛巾的莊稼漢和流著鼻涕的孩童。另外一張照片上，皇太子和皇太子妃，及另外兩個瑞典人，蹲在田野，享用午餐。時間是1926年11月7日，地點則是在太原市近郊的Yang-chu-chen。^⑧至少從形式上看來，皇太子確實給中國的官僚起到了模範作用，他輕車簡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

BY
J. GUNNAR ANDERSSON
CURATOR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LATE
DIRECTOR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SWEDEN AND MEMBER ADVISOR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BROADWAY HOUSE, 68-74 CARTER LANE, E.C.

1931

《黃土的兒女》是安特生以英文為一般讀者介紹中國史前史的著作。日譯本在1942年出版（見對頁）。

⑤ 拉格里奧斯是瑞典中國研究會（The Swedish China Research Committee），又簡稱China Committee或者瑞典文的Kinafond的重要成員，瑞典著名的實業家，與瑞典王室關係密切，是所謂瑞典王室的Chief Interdant。1926年皇太子訪問中國期間，拉氏隨行。此委員會由拉氏發起，開始由拉氏和Admiral Palander及另一位名叫G. Andersson的瑞典商業大學學院的著名經濟地理學家組成，時間在1919年9月15日，主要目的即資助安特生在中國的地質和古生物標本採集工作。這個委員會一般由三人組成，剛成立時，由Admiral Palander任會長，G. Andersson任秘書；1921年，Palander去世，瑞典皇太子（即H.R.H. Crown Prince Gustaf Adolf）接任會長。1928年，G. Andersson去世，由著名漢學家時任哥德堡大學教授的高本漢（B. Karlgren）繼任秘書。參見J. G. Andersson, The origin and aims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1, pp.11-27, 1929。另見Oscar Almgren et al., Crown Prince Gustaf Adolf as a Promoter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4, pp.1-14, 1932。

⑥ Andersson, 1929。另見 Almgren et al., 1932。

⑦ 此人是最早在中國任職的瑞典地質學家，先在山西大學任教授，後在太原建立奈斯特羅姆科學研究所並自任所長，他是介紹安特生來華的關鍵人物。參見J. G. Andersson, The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The MIT Press, 1972, p.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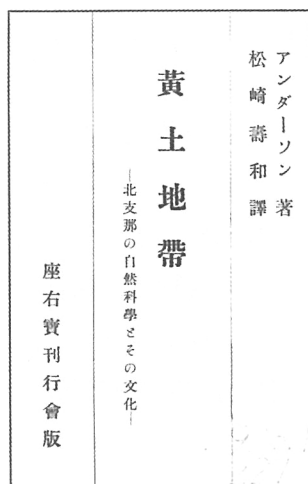
⑧ Almgren et al., 1932。

從，親執小鏟考察遺址，雖然在這種場合，不可能實際蹲在考古遺址，參加為時很長的正式的發掘工作，但是，就安特生所建議的「對展示科學的神聖性將發揮巨大的道德作用」而言，這一點也確實是達到了。安特生用「完全成功」形容這次山西之行⁹，可見他也認為此次考察達到了目的。如果有安氏給皇太子的這封信的背景，就知道安特生所謂的成功，不僅僅是學術上的，也不僅僅是對皇太子本人的，而是更有深義。

上面對皇太子1926年的來華訪問，略作敘述，目的在於考察安特生給皇太子的建議發揮了哪些作用。皇太子後來還訪問了天津、安徽和上海等地，在天津與羅振玉見面，並仔細觀察了羅氏收藏安陽殷墟出土的部份文物精品，如果這也算是「呼籲保護」的一部份措施，那這方面的目的顯然也達到了。另外，他還來到另外一個在中國鐵路任工程師的瑞典人卡爾見克（Orvar Karbeck）家裏¹⁰，仔細考查了此人的收藏品。此人以收藏中國的青銅器著名，後來他的收藏都成了東方博物館的藏品。這說明在這個方面皇太子也接受了安特生的建議。

如果從安特生的信看安特生本人，又有那些新的發現呢？

(1)雖然皇太子是考古學家，而且從1907年開始就收藏中國文物，對中國及東方文物發生興趣¹¹，但是安氏此信與其說是寫給作為考古學家的皇太子的，不如說是寫給作為國家首腦的皇太子的，他關注的主要是中瑞雙方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等方面的交往和瑞典在中國可能發揮的影響和得到的利益。這當然也同他作為一個瑞典知名學者的地位相符合。



(2)安特生從1914年來華，到1925年離開，在中國不間斷地待了十年¹²。他的經歷大概相當程度上影響到他的政治態度和人生觀¹³，他對中國人民和古老的中國文化始終抱有強烈的尊重和同情，從這封只給瑞典王儲看的私人通信裏¹⁴，也可以看出他對中國人民所受戰亂的同情和對腐朽的官僚體制的痛恨。

⁹ 安特生是這樣說的：「With the help of Professor Nystrom it was possible to locate, just outside Yaiyuanfu, the capital of Shansi, two Stone Age Sites, and the study of these sites formed for the royal visitors one of the attractions during the journey in Shansi, which proved a complete success, thanks to the preparations made by the provincial authorities, combined with the hospitality offered by Professor Nystrom.」見Almgren et al., p.13.

¹⁰ 參見Almgren et al., p.13 及Andersson, The Children, pp.208-210.

¹¹ Almgren et al., p.13.

¹² Andersson, The Children。

¹³ J. G. Andersson, Kineser och Pingviner. En Naturgorskars Minnen fran Jordens Fyra Horn, 1933.

¹⁴ 安特生的通信一般是瑞典文和英文，除了給母語是英文的朋友的通信是英文外，有時候寫給瑞典人的信也用英文，這種情況下，這信可能要給中國的官方或者私人閱讀，所以不用瑞典文，但是從我們有限的閱讀來看，安特生對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民的態度是一貫的，並沒有在沒有中國人在場的時候對他們及其所屬的文化帶有敵意和藐視。

¹⁵ Andersson, 1929; G. Andersson, The National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Natural History, Vol. XXI, No. 1, pp.4-

(3)他對新生的「把親自動手參加野外作業視為平常」的中國學者抱有深切的希望。除了這信，實際上他在很多個地方，對以中國地質調查所為代表的年輕一代寄予厚望。他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批地質學生（1913-1916）的教師和考官，並且能夠以把這些學生的大部份推薦為地質調查所的成員而自豪¹⁵。也以把這些年輕的中國知識精英介紹給皇太子而引以為榮。但是，又「對科學研究的一點點興趣，儘管可以按照西方更有效的工作方法加以引導和組織，但逐在起步階段」，而感到沮喪。

(4)他對中國的文物保護感到沮喪。相對於當時許多外國探險隊以盜竊等非法手段把中國文物偷運出國而言，安特生與中國政府簽訂的歸還一套完整的標本給中國，所有描述和研究在《中國古生物志》上發表的正式文件，給正常的中外文化交流樹立了一個榜樣，實際上無論是後來安氏本人還是他的繼任者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教授，都以安氏按照協議歸還中國採集標本為榮¹⁶，這種態度也是同他對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的尊重分不開的。安氏對某些外國人「常常是不適當的或者對中國人竟是侮辱」的試圖保護中國文物的那些「努力」，顯然是不贊成的；但是從他的身份考慮，也無法給王儲提出具體的意見。當時的中國還沒有文物法，連形式上的約束都難以進行，更談不上真正的文物保護。¹⁷實際上，安氏本人的文物標本比如為數眾多的甘肅彩陶，也是購買而來¹⁸。而安氏在東方博物館館長任上，更是同許多文物拍賣商有所來往，也收購了許多中國文物¹⁹。但這是當時通行的做法，直到今天西方大多數博物館也還在收買文物；安氏當時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為瑞典收集中國的古生物標本和文物標本，我們很難拿今天的道德標準要求他。問題的關鍵，是這種收集的手段是否得到中國政府的批准和理解。

12, 1921.

¹⁶ 參見Karlgrén, 1961, 及東方博物館檔案。

¹⁷ 參見古物保管委員會編輯：《古物保管委員會工作匯報》，大學出版社，北平，1935年。張繼在該書序言中這樣說：「我國有數千年之歷史，又復地廣民眾，所承襲於我祖先之遺產，較其它民族為豐富。二十世紀以來，歐美學者，竟以東方學術相號召，不惜重金購置吾國古物。奸商嗜利，搜求盜竊以供其求，古剝荒丘頓遭浩劫，重要史料，公然視為貿易之品。尤有甚者，外人深入腹地，自動採集，假調查學術之美名，組巨大規模之團體，在政府協助之下，任意捆載而去。他不具論，敦煌石室之寶藏，其最著者也。吾國學人，引為大憾，奔走呼號，輒少效果。迨國民政府成立，蔡子民先生長大學院，設各種專門委員會，本會始獲成立，聘委員若干人而屬繼主持之。嗣教育部成立，本會即直隸於教育部。其初會址設於上海，至十七年北伐成功，更設北平分會，以代當時私人組織之北平文物臨時維護會。時軍事粗定，北平文物賴以保存者尤多。嗣以北平為數百年之故都，眾議遷本會於北平，即以分會團城會址為本會會址。繼自受事以來，對於會務之進行，端賴諸委員之集思廣益。國內雖少成規，友邦頗多借鏡。爰釐定法規，錯定計劃，以期逐步進行。語云：『亡羊補牢，未為晚也。』」

¹⁸ 參見 Andresson, The Children, 1972。

¹⁹ 參見東方博物館檔案資料。

²⁰ G.J. Andresson, 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15,

總之，這封屬於私人通信的文件，比公開出版物更能披露安特生對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民的真實看法，使人高興的是，我們在這信裏看到的安特生和在出版物上看到的安特生是吻合的。他能在中國有劃時代的發現，並得到中國人民的尊重和懷念，也同安特生這樣的態度有直接的關係，這是我們以前注意不夠的^②。作為一個國際的知名學者，我們不能簡單地以道德標準要求他，但一個人的人格往往影響他的學術及其影響，卻是不爭的事實。^②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Östasiatiska Samlingarna)
STOCKHOLM



Bulletin No. 15

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BY
J. G. ANDERSSON

STOCKHOLM 1923



1926年，安特生以他在中國蒐集到的考古資料為基礎，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建立了東方博物館，並出版館刊，發表以中國考古為主的研究報告。安特生這本〈中國史前史研究〉（《瑞典東方博物館館刊》，第十五本，1943年），正文300頁，圖版200頁，可說是他的最後結論。

1943, pp.297-298；陳星燦：〈紀念仰韶文化八十周年——從安特生的一封信談起〉，《中國文物報》，2001年11月14日。

^② 李潤權博士曾閱讀本文並提出有益的建議，特此銘謝。